

●特别关注

我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者和表达者



许多电视剧出品方在选择文学原创素材时，常把目光投向小说，因为相对来说，小说的故事性较强，而且在二度创作中不受真实性的限制，改编空间大。但作家何建明的8部报告文学都被搬上了荧屏，央视今年的开年大戏又花落由何建明报告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奠基者》，这并非是何建明比别人幸运，从记者对何建明的访谈中就能找到答案。

问：每年央视的开年大戏都备受关注，今年在激烈的竞争中，根据你的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改编的电视剧《奠基者》脱颖而出，成为2010年央视一套的开年大戏，你认为该剧的哪几个点征服了审片组的专家和观众？

答：对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作品能作为央视“开年大戏”给观众看，当然是件值得欣喜的事，因为我们写作的目的就是给读者和观众欣赏的。不到一年中我有两部作品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我感到很高兴。这部《奠基者》正在播出，近日我接到的电话和短讯很多，观众朋友们给了我无数鼓励的话。我自己感觉该剧有几点是受到观众和专家们好评的：一是《奠基者》讲述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故事，除了个别人名用了化名外，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荧屏上。二是故事尽管讲的是5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的故事，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共和国的奠基者在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了科学发展的理念，这是特别难得的。三是摒弃高大全的写法，真实表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共和国部长的形象，而且是一位为国家、为人民干真事、干实事并且在工作中还犯过错误、又能不掩饰错误与个性的高级干部形象，这样的高级干部形象真实可信且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四是过去人们对大庆油田的认识仅仅是一个王进喜，真实历史上的王进喜是这场伟大的和平建设战斗中一位优秀的工人代表，而真正指挥并领导几万建设大军取得这场胜利的是余秋里、康世恩这样的英雄指挥者和领导者，他们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奠基者》是一部共和国建设史诗，真实是它的全部魅力所在，有别于其它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是根据我的报告文学改编的，而不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问：我知道，在你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你最看重这部《部长与国家》，由此你对电视剧《奠基者》一定非常期待，该剧导演康洪雷也是一位始终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且关注度很高的知名导演，这次的强强联手将带来一部什么样的开年大戏？

答：康洪雷是位表现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的高手，而我也是一名军人出身的作家，可以说我们两个年龄相近的男人都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者和积极的表达者。第一次听说制片人选择康洪雷当导演，我就说：太好了，男人戏应该由男人气概的导演来做。我也知道康洪雷在读了我的《部长与国家》后就誓言《奠基者》一定会比《我的团长我的团》更有“军”气！

问：你是和观众一样每天两集跟着央视播放观看，还是一口气全看完了？

答：在央视播出《奠基者》之前，我没有看过整部电视剧，所以现在我跟所有观众一样每天看两集，我完全是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来重温我的这部由文字转化成影像的作品。故而也蛮有意思，常常会评说“这儿比我原作好”，“这儿没理解我的意思”云云意见。但总体上我是满意的，因为拍一部电视剧背后的艰辛太多太多，演职人员的劳动应得到尊重。

问：对剧本的改编满意吗？当时没想着亲自操刀改编这部作品吗？你好像很少改编自己的作品，为什么？是没有时间，还是不忍心动自己的作品？

答：基本满意，有的地方也还蛮精彩。但有些地方还是觉得没有理解透原著的意思。《部长与国家》在我创作时就已考虑到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的，所以这部作品在我创作时特别有画面感，因此改编成电视剧后的许多故事，除了因为戏剧表演的必要倒叙和调整之外，可以说基本上是原原作中搬来的。

我有8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大部分是别人改编的。我不太插手剧本创作是因为我更擅长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文本写作，东西一“假”就感到别扭。而电视与电影必须考虑到戏剧效果，“假”是必然的，所以我不太适宜。《奠基者》除外，因为许多读者甚至包括中央领导把《部长与国家》都是当作小说来读的，这说明作品本身就非常“有小说”故事的元素和艺术感染力。我在创作《部长与国家》时，笔端涌动的净是画面，这是该作品能够比较顺利地搬上荧屏的重要基础。



动画片《虹猫蓝兔》：教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本报讯 由中影集团、湖南宏梦集团、嘉信时代等联手出品的励志动画片《虹猫蓝兔火凤凰》将于2月5日登陆全国各大影院的贺岁档，为寒假中的孩子们送上一份别具匠心的新春“动漫大礼”。片方日前在北京举办了该动漫影片主题推广暨海报发布。

《虹猫蓝兔火凤凰》讲述了扮作虹猫进行表演的魔术师小狸，在一系列阴差阳错中肩负起了与蓝兔等六侠一起完成七音合奏，催生凤凰涅槃，降服作恶多端的黑龙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小狸认清了自己的目标，决心做最好的自己，用魔法化解了一场危

《财神到》：明星齐拜年

本报讯 由中影集团与鼎龙达国际文化传媒联合出品，谭咏麟、张震、张雨绮、陶虹等实力明星联袂主演的贺岁喜剧《财神到》日前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电影的预告片和主题曲MV。该片将于春节前夕的2月9日上映。

影片在中国传统的财神故事中巧妙糅合了现代时尚的娱乐元素，讲述了三个来到人间“派发钱财”的财神在帮助“困难户”的同时寻找真爱的故事，其间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通过一系列有关爱情、亲情、友情的动人情节道出了爱的真谛。

明星们表示，接下这部片子不仅仅为了拍戏，更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广大观众拜年。

(黄 恋)



《奠基者》原著《部长与国家》已经发表四年了，原著不仅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而且在社会上已经有广泛影响，特别是中央领导和众多省部级领导一直对它特别喜爱。尤其像中石油、中海油等单位和上海、重庆等省市领导，一再推荐广大干部阅读此书。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同志还亲自批示号召自治区干部每人都要看《部长与国家》，并在《宁夏日报》上设专栏半年之久，干部们学习《部长与国家》后所写的体会文章远远超过了原著的文字，这让我非常感动。

问：谈谈《部长与国家》吧。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写这部作品。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写的题材，已经是过去时了，前期的采访和素材搜集应该是最难的。这部作品最想传什么？

答：《部长与国家》创作于2003年、2004年。当时中央军委原本让我写一部《余秋里传记》。我接到这个任务后，发现传记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很好的人物和题材，都是“史料”而没有故事。于是我决定不写一部流水账式的“传记”，要写一部真正有血有肉的高级干部形象的作品，绝对不能像多数“传记”成为束之高阁的“大砖块”。采访和创作都是冲着这样的设计进行的，后来在熟悉“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光辉一生后，更清晰和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案。现在看来，这种判断和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文学作品必须“好看”，必须精彩。问题是报告文学必须坚持真人真事，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难度，这也是小说为什么比较容易被改成电影、电视，报告文学和新闻通讯就很少改成电影、电视的原因。然而我一直不服这口气，因为当我无数次与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接触时发现：真实的生活总比“造假”的艺术要精彩得多，故而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报告文学超越小说艺术的机会和可能，可以说《部长与国家》就是我寻找到的一个特别完美的超越机会。

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前期的采访，这要做细致和艰苦的工作，其后是如何把真实的原材料创作成精美而又不虚假的故事来，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最初的写作是从小说开始的，所以在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时，常常会把小说艺术引用到笔端的文本之中。

《部长与国家》从表面看来是讲述了一段共和国初创时期一段惊天动地的故事，其实我想向读者和观众传递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共和国建设初期，他们爱憎分明、真实可爱，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勇于战斗、说到做到、无私无畏、赤胆忠心，他们同时又是爱民如子、克己奉公的人民公仆，我们应当铭记和学习老一代的高级干部，如果今天的干部们能够像老一代那样，那么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会走得更快，人民会更满意。

问：你的报告文学作品触及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人物，从“两弹一星”到三峡移民，从共和国的部长到贫困大学生，有人把你的创作概括为“国家叙述”，你怎样理解读者的这一概括，你认为“国家叙述”的核心是什么？

答：确实我写的题材似乎都很大，但大小与小说是相对的。作为文学作品，中有大小、小中见大，全景中见细节、细节内反映大景观，这都是基本的艺术要素。我的“国家叙述”其实是报告文学文本本身所决定的，而要反映现实的中国历史画卷，“国家叙述”是必然的。它的核心就是关注时代、关注民族的命运、关注民生和百姓疾苦。

问：我认为正是抓住了这一创作核心，你的作品才能立得住，才能受读者喜欢，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答：是这样，我会一如既往。

问：在你的一系列“国家叙述”作品中，你认为最好的一部就是这部《部长与国家》，为什么？

答：除了《部长与国家》外，另一部《国家行动》也是比较满意的，它也被搬上了荧屏，上了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

问：报告文学都是触及当下的现实题材，现实题材最敏感，不好写，你是如何把握的？

答：首先是创作的立场。带着国家责任、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以及民生感情，你就能把握好创作的方向。其次是需要艰辛细致的采访和独特的视角与感观。再就是表达能力。这三关每一关都必须全力以赴，不得半点马虎。

问：你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高产作家，是获奖大户，又是作家中惟一的劳模，这些足以令人羡慕。近年来，令许多未曾触过电的作家更加羡慕的是，你的多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视剧，且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其原因是你的作品题材贴近现实，还是你的报告文学中具备了文学魅力，我知道，很多影视剧出品方更愿意选择小说原创，你分析一下原因，给特想触电的作家传投点经验。

答：报告文学作品成功的一半是题材的选择。但能够把报告文学搬到荧屏上的关键因素是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如果一个小说家想让自己的作品有更多机会搬上荧屏，那么你把功夫下在编好故事上。如果你是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搬到荧屏上，那么你应该更好地注意在确保内容真实的前提下把功夫放在艺术追求上。没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是不值钱的。

问：通过多部作品被改编电视剧后，你如何看待文学原创对电视剧创作所起到的作用。我认为凡是有一个坚实的文学原著做基础的电视剧，其成功一定会八九不离十，除非不幸砸在了太糟糕的主创手里。

答：完全赞同。我认为，当今文学界要特别重视这样一个问题：以往的读者们现今绝大多数已转成了电视、电影和其它新兴媒体的观众。文学要想获得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就必须注意将原创文学转化为影视作品和其它新媒体传播艺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想要中国的影视艺术提高到新高度、新水平，就必须先把精力放在原创文学上。

问：你现在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作家，将来是否有做编剧的打算？

答：我希望自己以后成为文学原创者和影视编剧“两面手”。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创作者。

问：从以往经验看，一部电视剧热播后，为弥补在视觉上的不足，一定会引发读者对原著的阅读兴趣。随着《奠基者》的热播，也将再次带动《部长与国家》的热卖，你期待吗？

答：原著《部长与国家》比电视更精彩、更好看，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很多看过原作的读者的意见。我同意这一点。其实在《奠基者》播出之前，《部长与国家》早已在市场上有很好的景观，至今已再版10次了。央视播出电视剧后，很有可能再度引发一波销售热。

问：文学对影视剧的提升和影视剧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当下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一部电视剧一经热播，图书市场同步就会摆上该电视剧的文学文本，其实，其中大多是从电视剧中直接扒下来的剧本，它和小说读本是有区别的，势必对读者是一个误导，使现在有一些不大读小说的青年读者误认为这就是文学。出书没有错，但应该叫电视剧某某剧本为好，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答：我同意你的观点。在我看来，多数现有电视剧“赶”出书的东西基本上是次品和“水货”。现在这样的图书不少，我总体认为一个作家最好不要去从事这样的“副产品”制作——注意：这种作品基本上不会是创作，而是制作。

问：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所付出的远比小说、诗歌作家付出得多，你现在又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领导职务，工作和创作任务都很繁重，你是如何平衡和协调的？

答：尽管我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学是我全部的生命意义与生命激情”，但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当倾尽全部热情和智慧先把工作做好，然后再挤时间写值得写的东西。

(图为电视剧《奠基者》剧照)

●评 点

2009年的荧屏似乎注定成为战争题材剧的集中检阅和关注的焦点。《生死线》显示了与《我的团长我的团》明显不同的叙事方式，尽管这两者之间按照著者的创作意图有着某种关联性，如后者的“团长”是假冒前者的沽宁守备团上尉“龙文章”之名参加了滇缅远征军等，但两者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和角度，比较明显的就是《生死线》的聚焦点不是一个由溃兵油子组成的“川军团”与日寇的作战，而是一座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沽宁小城的存亡，这无疑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蕴，它成了一个特殊时期代表中国命运的符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以小城作为叙事对象的佳作，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等。但《生死线》显然更关注的是小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芸芸众生在面临民族危亡关头的生死抉择及其命运演示。

《生死线》以一个中国南方小城沽宁作为聚焦舞台，展现了抗战时期一群平民百姓在突如其来的外族侵略下或奋起反抗、或舍生取义、或助纣为虐、或苟且偷生的芸芸众生生态，讴歌了以共产党人欧阳山川为首的“四道风”抗日武装组织在八年抗战中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侠义肝胆和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布衣抗战”的传奇性史诗。编剧兰晓龙说过：“就整体而言，我想完成的是一部史诗剧，规模并不宏大，人物并非史实的名人，在席卷整个中国的抗战中，它几乎是一颗小小微尘。但正如《四世同堂》中用几户人家便写尽北平的苍凉，我想写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却舍生向死的布衣之士，一部小人物的史诗。”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小人物中间，因为不甘国土沦丧而领导或加入“四道风”抗日武装组织的几位男主人公：曾被国民党通缉而避居沽宁的共产党员欧阳山川；一身侠胆、重情重义的沽兴车行车夫四道风；原本生性懦弱、浑身散发书呆子气的核物理学者何莫修；誓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原沽宁守备团上尉副官龙文章。其中，欧阳山川无疑是全剧的“戏魂”和“戏眼”，而包括他在内的这四个男人则撑起了全剧的“戏骨”。全剧以这四个男人及其人生轨迹的相交作为经线，而以其周围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及其命运浮沉作为纬线，如全家惨遭日寇杀害而背起铡刀向侵略者复仇的农民窦六巴；为惨死的父亲和弟弟报仇而勇敢扛起机枪打仗的女学生唐真；甘愿散尽千金而在战争缝隙间求一线生存希望的商会会长高三宝；既想保护老婆孩子免受苦难又想助兄弟“四道风”一臂之力而被沙门诛杀的车夫古烁；被当做替罪羔羊顶着“汉奸”之名而不惜以死谢罪的原沽宁守备军司令蒋武堂；一心想做人人上不顾礼仪廉耻卖身求荣终于命赴黄泉的沙门少主李六野……正是这些血肉丰满的各色人像，“织”成了一张多维度、多侧面反映可歌可泣“布衣抗战”历史的立体画卷。

但《生死线》又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史诗剧”，它并非以编年体的纪实手法来记录八年抗战的全过程，那样的话，它就是史记而非“诗剧”了。它选择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38年（沽宁沦陷前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1945年夏（抗战胜利前后）来铺陈其事，这好比给全剧安上了三个“节骨眼”。小城沽宁的存亡，所有人物的命运皆与此“节骨眼”息息相关，并由此上演了小城沦陷、结盟抵抗、最后较量的沉痛悲怆的“布衣抗战”三部曲。穿插其中的既有耳熟能详的英雄传奇，如四道风、龙文章的形象，就不难看出路见不平的武林好汉的身影；也有令人称道的历史演义，如“军师”欧阳山川的身上，就集合着诸葛亮与“智多星”吴用的超人智慧，用深知其他人的思维的话说：欧阳是被枪指着也能瞬间想出十七八个主意的人；曾是他的学生的高昕则说：老师只要还活着就能让鬼子喝了他的洗脚水。但《生死线》与一般近乎神魔的武侠传奇和司空见惯的麻雀戏、地道战、地雷战等惯性思维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死线》的传奇性体现了一种在低调外侮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沉痛悲怆而又有期待希冀的“诗性”，而这种“诗性”一旦与民族气节和韧性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士兵突击》中“不抛弃不放弃”一脉相承的基因遗传。不是吗？当沽宁守备团在鬼子和倒戈的伪军夹攻下几乎全军覆没，沽宁在一夜之间沦陷敌手，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一方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恶魔，另一方则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强弱对比，一目了然。然而卧薪尝胆的弱者在精神上不见得就弱小；而挥舞枪械的强者在体魄上也不一定就强大，这就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也是《生死线》体现出来的“诗性”的真理。欧阳山川、四道风选择了以弱对强，组织起抗日武装进行殊死抵抗；龙文章放弃了跟随残余国民党军队入后大后方撤退而捐弃前嫌成为“四道风”的军事行家；先前那个胆小如鼠、懦弱无能的何莫修，竟然成了制造炸弹和把敌机从空中干掉的杀敌功臣。还有那些先后加入“四道风”组织的400多名成员，可很多时候他们只有20余人，是什么力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如此多“布衣”前仆后继、慷慨赴死？那只有用“不抛弃不放弃”来解释；只能用“家国不幸诗家幸”来赞叹！《生死线》中即使是一闪而过的人物身上，也彰显着这样一脉相承的“诗性”基因遗传，如沽宁城里那位拉二胡的怪人罗非烟，竟毫无畏惧地在侵略者面前一意孤行地拉着充满杀戮之气的《十面埋伏》，面对刺刀威胁仍然“不抛弃不放弃”地忘我地埋头拉琴，直到生命终结琴弦细断；而全剧结尾处，光复后的沽宁，又响起了他的徒弟罗非雨拉的二胡声。浓郁的“诗性”在琴声缭绕中再度弥散开来。

正是由于这一点，《生死线》才无愧于一部沉痛悲怆的传奇性“史诗剧”。



本版责编：高小立